

全党大兴 调查研究之风

1941年3月,毛泽东决定将他早期的农村调查报告汇编成《农村调查》出版。在撰写序言时,他着重阐述了调查研究应采取的态度和方法,并强调: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,只有眼睛向下,对群众满腔热忱,拜群众为师,才能做好调查研究工作。此外,他还重申了曾经被讥为“狭隘经验论”的著名观点——“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”,目的就是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。

5月19日,在延安干部会议上,毛泽东又作了《改造我们的学习》的报告,向全党提出了改造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的任务。他提议:“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际,对敌我三方的经济、财政、政治、军事、文化、党务各方面的动态进行详细的调查和研究工作,然后引出应有的和必要的结论。为此目的,就要引导同志们的眼光向着这种实际事物的调查和研究。”

8月1日,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《决定》,号召全党力戒空疏、肤浅,扫除主观主义作风,采取具体办法开展调查研究工作。中央下设中央调查研究局,担负国内外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种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。内设调查局、政治研究室、党务研究室三个部门,作为中央一切实际工作的助手。调查局担负收集材料之责,政治研究室担负根据材料加以整理与研究之责,党务研究室担负研究各地党的现状与党的政策之责。

在毛泽东的倡导和中共中央的大力推动下,各中央分局及各省委深入贯彻落实《决定》精神,先后设立了调查研究的专门机构,为中共中央领导好全面的调查研究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,全党上下开展了一场深入、深刻的调查研究活动。

此时,中共中央北方局驻太行山中的山西辽县(今左权县)麻田镇,领导着华北地区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和抗日工作。负责北方局工作的彭德怀积极响应中央号召,当即下达了《关于执行中央调查研究决定给各地的指示》,要求所辖太行、太岳、冀南各区委立即成立专人负责调查研究的科室,选拔政治素质过硬、文化水平较高、有着丰富工作经验的同志充实到研究室工作。“为了纠正当时注重一般的社会调查,而忽视了与党的现实斗争联系不够的倾向,并克服对党在华北五年的奋斗经验未能很好地整理与发扬的目的,调查的目的性和针对性就更加突出。”

1942年春,北方局调查研究室决定创办公刊《调查研究》,并将出版发行的时间定于当年的5月1日国际劳动节。

彭德怀 撰写发刊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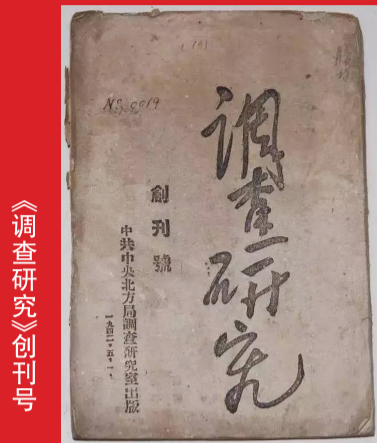
为办好《调查研究》,编辑人员纷纷深入基层作调查,他们还请彭德怀题写刊名并撰写发刊词。彭德怀欣然应允,挥毫题写了“调查研究”四个大字,这四个行草大字飘逸流畅、遒劲有力。

《调查研究》创刊号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彭德怀撰写的发刊词,题目为《对症下药——为〈调查研究〉的创刊而写》。据王焰主编的《彭德怀年谱》记载:“1942年4月20日,发表《对症下药》一文,阐述毛泽东关于加强调查研究的思想,要求华北党和军队的同志对中国社会和地方工作做深入的调查研究,防止空谈主义和主观主义。”

在发刊词中,彭德怀回忆了1928年12月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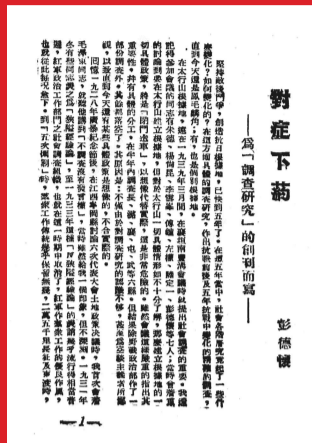
《调查研究》 在战火中创办的红色刊物

贾传静



《调查研究》创刊号

1941年8月1日,中共中央发布《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》(以下简称《决定》),在全党大力提倡调查研究之风。彭德怀负责的中共中央北方局积极响应,不仅出台具体执行的文件,还编辑出版了红色期刊《调查研究》,在北方局掀起了调研热潮,在我党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。



载彭德怀撰写的发刊词《调查研究》创刊号登

旬,他率领红五军到达江西省宁冈县县城,与红四军胜利会师,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时的情景:“在讨论六次代表大会土地政策决议时”,“就听他(毛泽东)讲到‘不调查没有发言权’。当时虽然给我一个印象,很不深刻。1931年有些同志讥之为‘狭隘经验论’”,“至1933年,这种‘反狭隘经验论’的讥消几乎流行得相当普遍。红军政治工作部门的社会调查组织,也就在这一时期中取消了,红军做群众工作的优良作风,也就从此每况愈下。到‘五次围剿’时,群众工作传统几乎保留无几。二万五千里长征及东渡时,才又重新恢复,但远不如红军初期做群众工作之认真。”

之后,彭德怀在文中回顾总结了全民族抗战爆发以来,改编后的八路军开赴华北创建抗日根据地,坚持敌后斗争五年的调查研究工作,找出存在的问题,“做出抗战前后及五年抗战中变化的精确的调查,直到今天还是凤毛麟角。有,也是个别根据地”。他还提到,1939年3月,八路军总部在山西襄垣南丰沟召开会议,参加会议的有朱德、彭德怀、杨尚昆、李雪峰、傅钟、左权、陆定一等,着重讨论在太行山建立根据地的问题,当时就提出社会调查的重要性。他写道:“对于太行山一切具体情形如不十分了解,那么建立根据地的一切具体政策将是闭门造车,以想象代替实际,这是非常危险的。虽然会议这样严重的指出其重要性,并有具体的分工,在半年内调查长、潞、襄、屯、武等六县,但结果除野战政治部做了一部分调查外,其余都落空了。其原因是:不仅由于对调查研究的认识不够,甚至为空谈主义者所鄙视,以致直到今天还有某些具体的政策是想象的,不合实际的。”

彭德怀在文中指出,主观主义不仅危害我军群众工作的优良传统和作风,而且助长了空谈主义,阻碍了许多同志对中国社会具体情况的了解,也就阻碍了许多同志应有的进步和实际智识的增进。他认为,实事求是,调查研究,了解具体情况,这不叫做“狭隘的经验论”,而是我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。只有盲目的、无前途的、无远见的、事务主义的所谓实际家,才叫做“狭隘的经验论”。

彭德怀又写道:“中央号召我们深入调查研究,了解具体情况,这是对对症下药。这剂药就是

医主观主义、空谈主义,是理论与实际联系,提高同志政治水平与实际工作能力的一贴有效的良药。”他痛感自己对中国及国际事情了解得非常不够,因此要耐心来做调查研究工作,攻破自己存在着的主观主义、虚心从小学生做起。他坚信“世上无难事,只怕有心人”,只要认真地“去做、去学,虽不敢说学到、做到如何的成绩,但我坚信只要虚心,总会有些成绩贡献给党,贡献给革命。我还希望某些同志放下自己的架子,眼睛向下,向群众中去学习,群众中有我们的老师。”

走出办公室 深入基层搞调研

为筹备好创办《调查研究》,研究室的工作人员和编辑人员各自前往调查地点,深入乡村、集市,走访各类家庭,与当地人们进行交谈,考察当地的基本情况。随后,他们对调查地的农业、经济、婚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,并结合当时的社会情况,对调查结果进行整理并撰写成文章,发表在《调查研究》的创刊号上。

中共中央北方局秘书长、八路军前方总部秘书长张友清撰写了《几点说明》,大力提倡积极的研究精神,鼓励大胆地深入地思考问题、分析问题、研究问题,尽一切可能地去了解具体情况。“只有把调查与研究有机地联系起来,才能克服主观主义,才能给我们的工作以帮助。”

北方局调查研究室主任张衡宇深入到基层、各地农村进行调查研究,撰写了《略论调查工作》。他提出了调查工作中的态度与方法:首先要做到“勤”,即腿勤、嘴勤、手勤;其次要做到“钻”,要在问题里边追问题,具有“打破砂锅问到底”的精神;再次要注意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;最后要具有改造的精神。他还提出在调研中应注意的几个具体问题:一是选择调研对象问题;二是接近群众问题;三是调查者的政治面貌问题。

中共中央北方局研究员、八路军总部秘书胡公素撰写了《敌寇在华北所实行的经济统制》;北方局社会部整风研究室主任郑思远撰写了《敌占

区谁发了财——太行路城县××村的调查》;中共中央北方局青年运动委员会也非常支持调查研究工作,撰写了《青年工作调查研究提纲》。

这些调研文章都很有深度,针对性也很强,涉及一些调查研究方法以及重要的战争、经济调查报告,不仅为当时人们了解相关信息提供了帮助,并且对于党内一些决策的制定提供了科学的依据,促使根据地出现了实事求是的调研之风。

真实报道剖析 各地调研工作

为了更进一步推动调研工作在全华北开展起来,贯彻中央的《决定》精神,改造党的全部工作,《调查研究》编辑部决定将调查研究工作在各地的开展状况加以介绍,并提出意见,以供各地参考。张友清在《几点说明》中说:“我们准备经常登载一些关于调查研究工作的方法方式的讨论与研究,经验的介绍与总结,同时对于各地调查研究工作的情况,也打算做一些报道与批评。”

为此,编辑部专门设立了“广播室”栏目,专为反映各地调查研究工作情况与交流各地工作经验。该栏目报道了晋察冀、山东、晋西北、晋冀豫、太岳、冀南、冀鲁豫等地的调查研究工作。报道说:自从中央发布《决定》后,已在华北全党引起相当注意,各地区的调查研究组织都已先后建立起来,开始进行了一些社会调查与研究。如在晋察冀,“调查统计的工作很早就已引起重视,在去年执行统一累进税中,即曾对农村经济情况及阶级关系变化做过比较精密的调查。调查研究工作已经在与各种实际工作结合起来,在各种工作中都贯彻着调查研究的精神,这是晋察冀党的各种工作的一大特色,也是晋察冀各种工作所以能够深入的重要原因。这种作风,值得各地党学习。”太岳区党委和太岳纵队在共同成立一个调查研究室的基础上,又成立了调查研究委员会,各个系统都有人员参加,以加强这方面的工作。研究人员深入乡村作调查,也取得一定成效。

在报道各地调研工作中,编辑部实事求是,并不一味地唱赞歌,而是毫不留情地指出存在的问题。报道说:“除个别地区外,一般说来,各

地党对于这一工作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,认真的有组织的、有计划的来进行这一工作,把这一决定的精神贯彻到一切工作中去,切实转变工作作风,还是非常不够的,很多地区在进行这一工作中还存在着不少的偏向。”如在报道山东分局调研工作时写道:“山东分局与各区党已建立调查研究室,各地委、县委均设专门的调查研究员,并已开始搜集敌友我各方面的材料,准备进行研究工作。分局在二月十号,并曾专门发出关于调查研究工作的指示,开始布置调查研究工作。”但同时也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剖析,指出“从分局这个指示上看,可以看出下面的几个问题”:一是调查研究计划过于庞大,包罗万象,应有尽有,没有突出一个时期的中心工作;二是计划过于空洞、一般化,只有任务、原则,而没有具体的步骤和方式方法,让下级感到无从着手;三是要求过高,急于求成,没有认识到调查研究工作是长期的事情,是细致的工作,容易使下级为忙于完成任务而潦草从事;四是没有使调查研究工作与党的领导、任务及各种实际工作结合起来,没有动员全党来重视和实施这项工作,没有把中央的《决定》精神贯彻到各项工作中去。结果可能出现为调查而调查、把调研工作当成只是调查研究机关或是几个调查研究员的事情。“不反对调查研究工作中的形式主义,不克服上述的这些毛病,则调查研究工作将只能停止在号召与空喊上面,对党的领导与工作是不会有什么利益的”。

在报道中,刊物还对冀鲁豫分区提出批评,“直至今日,对调查研究工作还没有收到任何报告,这就说明了冀鲁豫的党对于中央关于调查研究工作的决定,恐怕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”。

通过深入细致的报道,北方局各分局、区的调查研究工作得到了充分的展示,好的做法和经验得到了肯定和推广;对存在的问题也点评得恰如其分,被点评者心悦诚服,虚心接受并加以改进。

调查研究之风 在华北根据地蓬勃兴起

正当调研工作在北方局如火如荼开展之际,日军却从1942年5月中旬开始,对太行、太岳抗日根据地地进行大“扫荡”。

5月24日,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机关分西、北、南三个方向突围。张衡宇与《调查研究》编辑部的同事将所有重要文件和调查材料带好,在晚上趁黑夜突围,但在突围中几乎全部遇难。张衡宇只身突围出来,发现身边的勤务员没有出来,他不顾个人安危,绕路几十里终于找到勤务员。天渐渐亮了,他们又一次遭遇搜山的日军。张衡宇将勤务员隐蔽起来,掏出手枪向日军射击,将其引开。敌人发现他后,一齐向他射击,张衡宇不幸中弹,长眠于辽县的大山中,年仅35岁。

太行、太岳军民这次反“扫荡”胜利后,彭德怀便着手恢复调查研究室,复刊《调查研究》。可是,由于研究室人员在突围中大多牺牲,缺少编辑和调研人员,印刷设备也遭到损坏,《调查研究》最终没能复刊。尽管如此,编辑部剩余的同志们之后又坚持油印出版了几期业务研究材料《调查研究》,对推动北方局的各项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。

在创办《调查研究》的前前后后,北方局的各级机关干部在党中央大兴调研之风的号召下,纷纷深入到火热的生活中,结合自身工作实际,积极开展调查研究,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之风得到很好的遏制。正式的红色期刊《调查研究》虽然只出版了一期,但是促进了调查研究之风在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蓬勃兴起,一直传承至今,对党的建设和革命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。

有温度的待人之道

清风慕竹

北宋时,陈执中受到宋仁宗的器重,授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”,登上了宰相的高位。他的仕途火箭般攀升,是因为铁面无私,只讲原则,不讲私情。

陈执中当上宰相后,他的女婿求他给个官儿当,他板起面孔说:“你真把咱家当官帽批发市场了,官职是国家的,不是咱家卧室箱柜盒中之物,你有什么资格得?”女婿听后悻悻而归。

这件事传到了宋仁宗耳朵里,他更是以为自己用对了人。后来有谏官屡次进言,说陈执中不学无术,非宰相之器,宋仁宗都不为所动,回了句:“人臣事主,以不敢为先。”

后来人们评价陈执中“在中书八年,人莫敢于以私,四方问遗不及门”,意思说他为相八年,没人敢用私事求他,没人敢到他家去送礼。

运用公权力治理国政,陈执中无可指责,但在治家上,他却出了问题,谏官们攻击他不配宰相之位,理由是“闺门之内,礼分不明”。原来陈执中的妻子没能生下儿子,而他宠幸的爱妾张氏却为他成功延续了香火。张氏因子而贵,依仗陈执中的宠幸,骄横跋扈,不仅不把正妻放在眼里,对府中的下人更是视如蝼蚁,动辄打骂。至和元年(1054)冬,家中13岁的女奴迎子因小事拂逆张氏,被张氏毒打,“累行箠掠”“穿冬裸冻,封缚手腕,绝其饮食,幽囚腐锁,遂致毙路”,不仅多次用鞭棍殴打,还在冬天让她赤身裸体在外冻着,捆住手腕,不给饭吃,最终被活活折磨死。

家里出了人命,惊动了官府。开封府派人验尸,尸身伤痕累累,死因很明显,就是殴打致死。而身为宰相的陈执中对死去的女婢毫无同

情之心,只有对爱妾的袒护之意。按照宋朝的刑律规定,如果是妾杀了奴婢,虽然可以减轻处罚,依然要承担主要责任。但“其有怨犯,决罚致死及过失杀者,各勿论”,若是主人因为惩罚下人,没有掌握好火候,过失致其死亡,则可以追究责任。因此,陈执中便将事情揽到了自己身上,毅然替张氏背了黑锅。

有了靠山的张氏恃无恐,没过多久,又一婢女海棠因触怒了张氏,被打得遍体鳞伤,海棠不堪凌辱,自缢而死。短短数天,陈府中相继出了两条人命,引起舆论哗然。开封府尹蔡襄下令严加查勘,而弹劾陈执中的奏章也像雪片一样飞往禁中。宋仁宗不得已,先后派出三拨官员调查,在舆论的压力下,最终以陈执中被贬官而草草收场。

可是,陈执中的伞纵然很高,一时护得住家人,却改变不了她们最终的命运。陈执中死后,小妾张氏大概也知自己罪孽深重,出家做了尼姑,想常伴青灯古佛修行弥补。张氏所生儿子名叫陈世儒,他长大后把张氏接回了家。然而,天道轮回,陈世儒也娶了一个悍妻,一言不合对张氏轻则辱骂、重则出手。

陈世儒以国子监补授太湖县令,他在京城宰相府锦衣玉食惯了,来到这穷乡僻壤实在是待不下去,可没了老爹这棵大树撑腰又回不去,结果他与其妻李氏想了一着常人做梦都想不出的毒计:谋害亲母,以丁忧回京。

于是,李氏配好了毒药,掺进饭里给张氏吃了,没想到张氏抗毒能力奇强,竟然不死。夫妻俩觉得药量终究掌握不好,索性来个干脆的吧。这天夜里,俩人把一枚铁钉钉进了张氏的

脑骨中,一生为恶的张氏终于得到了报应。

第二天,陈世儒就上奏朝廷以丁忧北归。可惜人算不如天算,后来他的婢女因为与李氏争宠,将此事告官,陈世儒与李氏都被处死了。

据传,宋神宗顾念陈执中没有祭祀之人,曾经大发慈悲,想刀下留人,放过陈世儒。关键时刻,时任御史中丞的蔡确补上了一刀,他说:“五刑之中,罪莫大于不孝,其可赦乎?”神宗无言以对,陈世儒遂被处斩。

蔡确在陈执中死后还盯着不放,也是有前因的。当初蔡确的父亲蔡黄裳是陈执中手下官员,年已七十还不肯退休。陈执中将他召到面前,威胁说:“你如果不打辞职报告,我就上书朝廷辞退你。”蔡黄裳不想退是因为家里人口多,生活拮据,都靠他这一份工资养活,现在没办法,他只好灰溜溜辞职了。蔡家自此愈加困难,蔡黄裳拉扯两个儿子读书,连粥都喝不上。临死前,他把儿子蔡确叫到身边说,“儿子,记住是谁让我们落入如此境地的,此仇不报,你別姓蔡了。”

当初陈执中不同缘由的冷冷一言,换来了蔡确念念不忘的无情追杀。

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医学院的科学家曾做过一项有趣的研究,他们让志愿者观看人们把手放入冷水的视频,结果发现这些志愿者的体温出现了明显下降。科学家由此得出结论,人类很容易受到“温度的传染”。没错,在一个由人组成的社会中,温度是会传染的。当你给别人一个冷漠的眼神,传递回来的可能就是满面冰霜;当你给人的是一双冰凉的手,传递回来的可能就是寒寒刺骨的镣铐。

陈执中的悲剧警示我们,于世间待人要多些体谅,多些关爱,所有热情的给予都是有温度的,而这正是一个温暖的社会能量的来源。

历史随笔

独行不愧影

晏建怀

说起南宋理学家朱熹,几乎无人不知,但说到另一位理学家蔡元定,熟悉的人恐怕就不多了。然而,蔡元定却是朱熹最佩服的人之一。当初,蔡元定向学于朱熹,对谈数语,朱熹立即惊呼:“此吾老友也,不当在弟子列!”佩服之情,溢于言表。

蔡元定少年聪颖,八岁能诗,日记千言,过目不忘,堪称神童。他从小接受儒家经典的教育,及长,结庐家乡建阳县(今福建南平市)西山绝顶,以蔬果野菜为食,忍饥挨饿,埋头苦学。著有《大衍详说》《律吕新书》《八阵图说》《皇极经世指要》等书多部,终成一代理学大师。

蔡元定这位被朱熹初次见面就惊呼为“老友”的人,不特著作等身,学问深厚,而且在南宋那些学富五车的大师级人物之中,也是颇特立独行的一个。为什么?因为他好学问,却不好做官。

蔡元定与朱熹,一个结庐于建阳西山,一个建馆舍于建阳考亭,近在咫尺,每每对榻讨论诸经奥义,常至夜时分。他们广博而深厚的学问,吸引着各地的学子云集,可谓摩肩接踵,蔡元定也随之声名远播。当时的太常少卿刘表、秘书少监杨万里,在了解到蔡元定的学向后,联名将他推荐于朝,朝廷随即下诏召他做官,蔡元定却称病坚辞。

而且,为了躲避外界的骚扰,表达不为世俗利禄所诱惑的决心,蔡元定正式筑室于西山,作为读书和隐居的终生之计。然而,树欲静而风不止。朱熹晚年卷入了外戚韩侂胄和家室赵汝愚的政治斗争,韩侂胄得势后,为打击政敌,开启了“庆元党禁”,朱熹被斥为“伪学魁首”,遭到罢官去职的处罚。朱

熹门生学友,牵连甚广,一介布衣的蔡元定也难逃厄运,庆元三年(1197),平民之身的他因“羽翼之罪”,被流放到南蛮之地的道州(今湖南道县)编管。

蔡元定不仅是一位特立独行的学者,更是一个坦荡率性的诗人。当时,朝廷下发了判决文书,州官县吏闻风而动,追捕甚急。而蔡元定却不“辞家即就道”,竟然连家人都不打声招呼,就赶往三千里外的道州。朱熹得知后,率数百门徒为他饯行。那些平日里因学问交流而建立了深厚师生情谊的学子们,见蔡元定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待遇,愤慨者、叹息者甚至悲泣者不少,蔡元定却泰然自若,“不异平时”,连朱熹都不禁感叹连连。

蔡元定看到弟子师友们一片悲戚,当场赋诗一首道:“天道固漠漠,世路尤险峻。吾生本自浮,与物多瑕玷。此去知何事,生死不可期。执手笑相别,无为儿女悲。轻醉壮行色,扶摇动征衣。断不负所学,此心天所知。”他不但自己无怨无悔,反而安慰同乡们,“执手笑相别,可见儿女悲”,其内心的坚强和胸怀的坦荡,无为一斑。尤其那句“断不负所学,此心天所知”,表现出一代学人的自尊与自信,让人感慨,令人动容。

吟诗完毕,蔡元定慷慨就道,年过花甲的他,辗转数日,步行三千里赶赴贬所,直走到双脚流血。来到道州后,气候不适,身体多病,蔡元定身心俱受摧残,但他依然继续读书,继续著述,继续讲学。第二年秋,蔡元定终因贫病交加,逝于贬所,终年六十四岁。

蔡元定曾在给儿子们的信中教育他们说:“独行不愧影,独寝不愧衾,勿以吾得罪故遂懈。”而这,与其说是其教育后代的勉励之语,毋宁说是蔡元定自己的写照——“不怕嘲笑,不怕误解,不怕屈辱,不怕打击”,“独行不愧影,独寝不愧衾”,坦荡磊落,且执著于学问追求,心无旁骛,至死不渝。